

清宮傳世的一件高麗青瓷象嵌雲鶴紋碗

■ 謝明良

正在國立故宮博物院「閑情四事——插花·焚香·掛畫·喝茶」展出的〈高麗青瓷象嵌雲鶴紋碗〉，是目前所知為數極少的高麗青瓷傳世例之一，其也是清宮唯一一件高麗青瓷傳世器。巧合的是，日本山形縣本間美術館也收藏了一件在尺寸、造型、紋樣，甚至口沿所鑲金屬鈎邊等各方面都和故宮藏品一致，並且也是傳世器的高麗青瓷碗。兩者之間是否有關？值得略予追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宮傳世〈高麗青瓷象嵌雲鶴紋碗〉（圖1），是已知為數不多的高麗青瓷傳世例之一。¹該碗入藏清宮的途徑或之前的流傳情況已不可考，不過考古發掘和文獻記載卻也顯示歷史上中國區域的人們對於高麗朝（918-1392）的陶瓷似乎並不陌生，如浙江省杭州南宋臨安城遺址一帶就採集到不少高麗青瓷標本，有的還在燒成後鐫刻「貴妃」字銘（圖2），後者表明其原是南宋內苑用器；2001年杭州市上城區發掘南宋臨安城中一處推定是寧宗楊后（1162-1233），即恭聖仁烈皇后邸宅遺址也出土了高麗青瓷殘片，恭聖仁烈皇后正是中國藝術史上大名鼎鼎的楊妹子，她在慶元六年（1200）進貴妃，後因恭淑（韓）皇后崩，旋即被寧宗立為后。

本文引用以上事例無非是想說明中國區域至遲在南宋十三世紀時，已將高麗青瓷逕與汝窯、定窯或南宋官窯等名窯製品共同納入宮中用器，成書年代不晚於明代的傳南宋太平老人著《袖中錦》既將「高麗秘色」與定窯白瓷等

名物同列為天下第一，迄方以智（1611-1671）《物理小識》也提到「高麗窯似龍泉」。後者說法出自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論》，該書卷七〈高麗窯〉條目評論古高麗窯器皿是「色粉青



圖2 「貴妃」刻款高麗青瓷瓷片 杭州南宋臨安城遺址一帶採集取自馬亦超，《南宋杭州修內司官窯研究》，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6，頁272，圖235。



圖1 12世紀後期至13世紀前期 a. 高麗青瓷象嵌雲鶴紋碗 b. 內側 c. 底部 高6.5，口徑16.1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與龍泉窯相類，上有白花朵兒者，不甚值錢」，毫無疑問，這種裝飾著白花朵且施單粉青色釉的古高麗窯製品，指的正是高麗象嵌青瓷。由於高麗青瓷象嵌技術的起源和開展直接關係到

做為本文主旨之清宮傳世〈高麗青瓷象嵌雲鶴紋碗〉的斷代問題，所以有必要先簡單地介紹該一課題的研究現狀，以利參考比較。

所謂象嵌青瓷，是在已成形的素陶坯上陰

刻紋樣，然後在溝槽內填充白土或赭土，再施罩青瓷釉以高溫燒成。習慣上，將刻線紋象嵌稱為線象嵌，將減地人物花卉等圖紋稱做面象嵌，另稱呼剔除紋樣以外背底並填充白土的技法為逆象嵌，後者外觀裝飾效果近於中國磁州窯類型的白地黑剔花。

有關朝鮮半島象嵌青瓷的討論，可分為初始期和成熟期等兩個時段。前者如京畿道龍仁郡西里窯標本，是在粗白土上以面象嵌技法施加綠褐色土，並加飾鉤狀白土線象嵌，其相對年代約在十世紀；全羅南道咸平郡良才里窯址標本則是在青瓷土坯上施加黑色粗線和面象嵌，相對年代約在十世紀後期至十一世紀前期，²但其和十二世紀後期成熟期製品之間有斷層，諸多疑點尚待釐清，目前學界一般是以傳毅宗十三年（1159）文公裕墓的象嵌青瓷為成熟期年代最早的紀年遺物，和本文直接相關的即是這類製品。

依據墓誌得知卒葬於大歲乙卯（1159）的文公裕墓出土的象嵌青瓷，其釉調精良，象嵌技法已臻成熟（圖3），但由於高麗第十七代仁宗（1122-1146 在位）長陵所見青瓷並未見象嵌

裝飾，中尾萬三因此認為高麗青瓷象嵌技法應萌生於十八代毅宗期（1147-1170 在位），³野守健在衡量諸多周邊資料的基礎之上，繼而主張文公裕墓象嵌青瓷的年代最有可能是仁宗元年至毅宗十三年（1123-1159）之間。⁴目前學界對於傳文公裕墓等高麗象嵌青瓷編年的評估，基本仍是沿襲半個世紀前中尾和野守兩氏的看法。

對於本文來說，高麗第十九代明宗（1170-1197 在位）智陵出土的象嵌青瓷更是不容忽視的珍貴資料，這不僅是因其在高麗青瓷編年史上如同文公裕墓般都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所見象嵌青瓷碗除了尺寸較大之外，其裝飾意匠也和清宮傳世〈象嵌雲鶴紋碗〉有相近之處。（圖4）首先，故宮藏清宮傳世〈高麗青瓷象嵌雲鶴紋碗〉（以下稱故宮碗），高6.4公分，口徑16.1公分，足徑4.2公分，比起智陵出土〈青瓷象嵌荔枝唐草紋碗〉（以下稱智陵碗），高8.6公分，口徑20.2公分，底徑5.8公分，尺寸相對較小。不過，儘管故宮碗口沿裝鑲著金屬釦，仍可看出碗略呈直口，口沿以下弧度內收，下置矮足，其造型與智陵碗相近。在紋樣裝飾



圖3 a. 高麗青瓷寶相華唐草紋碗 b. 內側 傳京畿道開本郡文公裕墓（1159）出土 高6.2，口徑16.9公分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韓國指定國寶 取自菊竹淳一、吉田宏志編，《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10·高句麗·百濟·新羅·高麗》，頁319，圖237、238。



圖4 a.高麗青瓷象嵌荔枝紋碗 b.內側 c.底部 d.線繪圖 明宗(1202年歿)智陵出土 高8.6,口徑20.2公分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 取自海剛陶磁美術館,《高麗時代後期:干支銘象嵌青磁》,利川:海剛陶磁美術館,1989,頁39,圖50;頁67,圖版50。

方面,故宮碗外壁近口沿部位飾兩道填白土的象嵌弦紋,弦紋下方至碗腹之間,等距分布四朵外框雙圈的折枝菊,菊瓣由白土和赭土錯落組成,雙圈菊紋之間飾展翅飛翔的鶴,鶴眼、喙和肢爪為黑象嵌,鶴紋兩側飾白象嵌雲紋。相對於以上黑或白象嵌飾,碗腹側以逆象嵌,即以剔除紋樣背底而填以白土的技法來表現卷草裝飾帶,類似作風的逆象嵌裝飾帶既見於智陵碗外壁碗身部位,而後者所見雙圈折枝菊象

嵌也和故宮碗同類紋樣有異曲同工之趣。其次,故宮碗內壁近口沿處有一周白象嵌卷草,以下間隔分布五株荔枝紋,而類此裝飾題材和排列布局也見於智陵碗,不同的是智陵碗所見卷草和荔枝紋更為明晰而講究。另外,相對於智陵碗碗心飾荔枝紋,故宮碗碗心則又是以逆象嵌的技法來表現碩大的菊瓣紋,而於碗心飾逆象嵌菊瓣紋之例,則見於前述京畿道開豐郡文公裕墓(1159)的著名〈青瓷象嵌寶相華唐草紋碗〉



圖5 13世紀後半 a. 高麗青瓷象嵌雲鶴紋碗 b. 底部 韓國木浦新安沉船（至治3年，1323）打撈品 高5.9，口徑14.2公分 取自文化財廳、國立海洋遺物展示館，《新安船The Shinan Wreck》，木浦：文化財廳、國立海洋遺物展示館，2006，頁12，圖6。



圖6 高麗青瓷象嵌荔枝紋碗 扶安柳川里窯 取自梨花女子大學校博物館編，《扶安柳川里窯 高麗陶瓷》，首爾：梨花女子大學校出版部，1983，頁73，圖185。

碗心部位。（同圖3）至於碗的裝燒特色，則故宮碗和智陵碗均施滿釉，並在矮圈足內置三只硃石質支釘。

經由以上觀察比較，不難看出故宮碗除了尺寸較小，釉質略偏灰綠，不若智陵碗有著青純色釉之外，其造型、紋樣題材或布局構圖等各方面均酷似智陵碗，故可推測兩者年代也應接近。1916年發現的位於今開城市長豐郡智陵里的明宗智陵曾數次遭受盜掘，由於明宗

在位二十七年（1170-1197），崩於神宗五年（1202），葬於智陵，但智陵在高宗四十二年（1255）曾因蒙軍破壞而再予修繕；上引歷史事件的年份，正是學界對於陵墓件出青瓷定年之所以會出現1197年、1202年和1255年等不同說法的主要根源。⁵其中，1197年（或1198年）說是誤將明宗退位年視為駕崩年次，而認為智陵青瓷或是1255年修建時所置入的說法，亦難實證，⁶因此本文在認同學界主流論述的同時，



圖7 高麗青瓷象嵌荔枝紋碗 扶安柳川里窯 取自梨花女子大學校博物館編，《扶安柳川里窯 高麗陶瓷》，頁74，圖188。



圖8 12世紀後期至13世紀前期 a. 高麗青瓷象嵌雲鶴紋碗 b. 內側 高6.9，口徑16.3公分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取自該館網站：<https://webarchives.tnm.jp/imgsearch/show/C0078921>，檢索日期：2022年7月28日。

傾向將故宮碗的年代保守地訂定在十二世紀後期至十三世紀前期之間。另外，韓國木浦元代至治三年（1323）新安船也打撈出作風與智陵或故宮碗類似，但紋樣已趨形式化的〈青瓷象嵌雲鶴紋碗〉（圖5），一般認為後者年代可能是在十三世紀後半，⁷是新安船舶載前期古瓷當中的一例。另外，關於智陵碗、故宮碗等〈高麗青瓷象嵌雲鶴紋碗〉的產地，以往並存全羅南道沙堂里窯和全羅北道扶安柳川里窯等兩種

說法，從窯址出土標本看來，兩窯都燒造有此類象嵌青瓷，以筆者所見有限資料看來是與扶安柳川里窯出土標本更為接近。（圖6、7）

另一方面，與故宮碗在造型、尺寸、紋樣、布局排列，甚至外底的三只硃石支釘等各個方面，幾乎完全一致的〈高麗青瓷象嵌雲鶴紋碗〉，既見於美國弗利爾博物館（Freer Gallery of Art），⁸還見於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和山形縣本間美術館收藏。前者是明治三十八年（1905）



圖9 12世紀後期至13世紀前期 a. 高麗青瓷象嵌雲鶴紋碗 b. 內壁 c. 內壁和口沿局部 d. 外壁 e. 底足 (b~e由山口博之先生攝影惠賜)
高6.9, 口徑16.5公分 日本本間美術館藏 取自該館網站: <https://www.homma-museum.or.jp/collection/>, 檢索日期: 2022年7月28日。



圖10 五代 銀稜越器 中國江蘇省揚州西湖鄉出土 揚州博物館藏 取自揚州博物館等編，《揚州古陶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圖81。



圖11 定窯鳳紋洗 中國遼寧省法庫葉茂台遼墓出土 遼寧省博物館藏 取自馮先銘，《中國陶瓷全集9·定窯》，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京都：美乃美出版社，1981，圖版30左。



圖12 南宋 龍泉窯 青瓷蓮瓣紋碗 高8.6，口徑13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入藏的原帝室博物館藏品（圖8），後者更是自江戶時代加賀藩前田家以來流傳有緒的名品，依據該館網頁的說明，該碗有可能是加賀五代藩主前田綱紀（1643-1724）為祝賀養女蝶姬和庄內藩五代藩主酒井忠寄（1704-1766）締結婚姻時的禮物，⁹現藏山形縣本間美術館，屬縣指定文化財。（圖9）由於本間美術館藏品（以下稱本間碗），口沿亦鑲金屬釦，不由得讓人再次連想到鑲金屬釦邊的故宮碗。承蒙東北學院大學山口博之先生和本間美術館田中章夫館長

的協助，筆者有幸透過視訊影像拜觀了本間碗的外觀細部，得以確認本間和故宮兩碗無論是在器形、尺寸、內外壁象嵌紋樣或布局安排，以至外底所見三只硅石支釘等各方面均極相近，甚至兩碗口沿金屬釦邊的意匠也顯得一致，令人懷疑會不會是來自同一區域作坊的加工。

中國至遲在唐代已見在陶瓷器皿口沿裝鑲金屬釦邊，到了宋代還對釦邊的質材有所規定，如「非三品以上及宗室戚里之家毋得金釦（器具），用銀釦者毋得塗金」（《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一九，景佑三年（1036）八月己酉詔）。¹⁰不過從考古出土遺物看來，唐宋時期陶瓷金屬釦的質材雖有金、銀、鉛錫等之別，絕大多數釦邊厚度薄，但邊幅卻頗寬（圖10、11），至如故宮碗或本間碗般呈窄邊作工的鑲釦例則頗見於清宮藏品，此如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的一件南宋龍泉窯蓮瓣紋青瓷碗的金屬釦，從釦邊的造型作工看來鑲裝的年代不能上溯宋代，但具體的加工時代不明。（圖12）事實上，清宮傳世鑲釦例在外觀、材質或呈色等諸方面，其實頗為多樣，以筆者的能力，大約僅能粗估其裝鑲年代不能上溯宋代或元代，卻也無法具體區分明代和清代釦邊的異同。

從金澤貞顯（1278-1333）予鎌倉稱名寺長老釵阿（1261-1338）書函提到「建窯ふくりんかけ給候へきよし承候，悦」，或室町時代京都相國寺鹿苑歷代蔭涼軒主公用日記《蔭涼軒日記》載「以藤左折帑遣昌子於銀工五藤宅，建蓋之金覆輪著付晚來可出來」（明應二年〔1493〕八月十八日條）等文獻記載，¹¹可知日本在鎌倉時代後期以來至室町時代均有在陶瓷鑲釦之風，天文二十三年（1554）《茶具備討集》還特別記載了尾州瀬戶天目可見「鑰石、或錫或鉛之覆輪也」¹²只是其和中國鑲釦例的區別，目前仍不明朗。但應予一提的是，現藏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的國指定重要文化財南宋吉州窯〈葉紋蓋〉，同樣是加賀藩主前田家傳來的著名文物。（圖13）江戶時代弘化三年（1846）《加賀前田家表御納戶御道具目錄帳》「しんちうふくりん（眞鑰覆輪）平茶碗」，而前引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吉州窯蓋之內外木箱亦見「志（し）ちうふくり（り）ん平茶碗」箱書，可知指的是同一件作品。¹³該吉州窯口沿所鑲金屬釦曾經X射線螢光分析，得出結論是混合了約15%的銀和若干銅的金釦，¹⁴小林仁結合中國發掘出土標本所見茶碗金屬釦邊多為銀、錫、銅等質材，少以金為之，認為其金釦乃日本所裝鑲。¹⁵就該吉州窯口鑲窄邊金釦的作工與宋代出土標本所見寬幅金屬釦意匠迥然不同這點而言，筆者也贊同小林氏的說法。

問題是，考古出土或傳世陶瓷所見金屬釦邊極為多樣，僅憑肉眼觀察已可看出釦邊質材既有金，也有銀或銅和鉛錫，經由科學分析得知還有由銅和鋅、錫和鉛或鍍金等合金所製成。¹⁶如果先不論金屬釦邊的成分，則故宮碗因曾皮藏清宮，故其金屬釦的裝鑲地點極可能是在中國區域，但確實加工年代不明；本間碗釦邊的

裝鑲年代和地點同樣難以確認，但因釦邊的形狀與故宮碗相近，所以個人認為似乎不排除其加工地點也有在中國區域的可能性。無論如何，朝鮮半島出土的陶瓷鑲釦例提供我們檢視時代工法甚至製作地點時的珍貴線索。

早在1940年代，曾任職朝鮮總督府的野守健就報導過裝鑲銀釦邊的高麗青瓷蓋盒，以及原李王家博物館藏的一件高麗青瓷碗。¹⁷蓋盒見於今韓國中央博物館藏傳墓葬出土之相對年代在十三世紀的〈象嵌菊唐草紋盒〉（圖14），



圖13 南宋 吉州窯 葉紋碗 高5.2，口徑14.7公分 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重要文化財 取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特別展「黃金時代の茶道具—17世紀の唐物」圖錄》，大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2015，頁71，圖43。



圖14 13世紀 高麗 青瓷象嵌菊唐草紋盒 高3.2，口徑8.2公分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 取自황현성、장민경，〈한·중 금구자기의 금속 성분분석을 통한 재료특성별 적용사례와 심미안적 연구—국립중앙박물관 소장 금구자기를 중심으로—〉（韓、中金鈎瓷器金屬成份分析所見的材料特性適用事例和審美研究），《한국도자학연구（韓國陶瓷學研究）》，13卷2期，2016年8月，頁219，圖5。



圖15 12世紀 a. 青瓷陽印刻蓮唐草象嵌牡丹紋銀釦碗 b. 內側 高7.7，口徑18.7，底徑6.3公分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 取自國立中央博物館編，《高麗青磁名品特別展》，首爾：國立中央博物館，1989，頁105，圖1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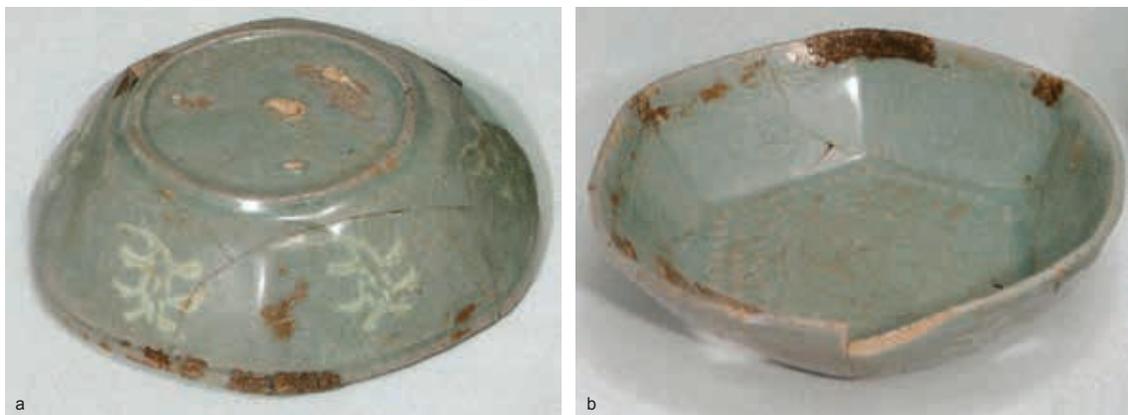


圖17 12世紀前半至13世紀前半 高麗 a. 青瓷碟 b. 內側 京畿道坡州惠蔭院址出土 高3.4，口徑13公分 韓白文化財研究所藏 取自이애령、강경남編，《고려 왕실의 도자기》，頁55，圖55。

盒身上沿和子口部位，以及盒蓋下方母口周圍飾主要成分為金、銀、汞的銀鍍金釦邊；而原李王家博物館的十二世紀陽紋印花蓮花唐草象嵌牡丹紋碗，現亦歸韓國中央博物館藏，並於1990年指定為國寶（253號）。（圖15）該碗據說出自開城一帶墓葬，但詳情不明，1913年由李王家博物館購入，碗口沿包鑲銀釦。¹⁸ 銀釦厚度薄，邊幅寬，而類此之薄胎寬邊的金屬釦既和前引象嵌唐草盒相近（同圖14），也和仁川廣域市江華郡熙宗（1204-1311在位）碩陵出土殘留有金屬釦痕跡的象嵌菊花唐草紋碗（圖16），或京畿道坡州惠蔭院址等考古發掘出

土的相對年代在十二至十三世紀的多方盤和圓盤所見鑲釦例一致。（圖17）不僅如此，其也和中國唐宋墓所見諸多陶瓷鑲釦例作風相近，此說明了薄胎寬幅的金屬釦邊是東亞朝鮮半島高麗朝和中國唐宋時期陶瓷鑲飾共通的審美趣味，而朝鮮半島也確實出土了口沿鑲釦的宋代定窯〈柿釉碗〉。¹⁹（圖18）

經由以上案例的比對，可以明確地提示如故宮碗或本間碗般厚胎窄邊的金屬釦，不會是兩碗燒成時期即十二世紀後期至十三世紀時的加工。朝鮮王朝《世宗實錄》卷五十三載世宗十三年（1413）「且前賜磁器，用輒



圖16 13世紀前半(仁川廣域市江華郡) 高麗 青瓷象嵌菊花唐草紋多方碟 高麗熙宗(1204-1211在位) 碩陵出土 高5.8, 推定口徑17公分 韓國國立文化財研究所藏 取自이애령、강경남編, 《고려 왕실의 도자기(高麗王室的陶瓷)》, 首爾: 國立中央博物館, 2008, 頁35, 圖30。



圖18 北宋 定窯 柿釉碗 高麗古墳出土 高5, 口徑13, 底徑3.6公分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 取自國立中央博物館美術部編, 《國立中央博物館所藏中國陶磁(국립중앙박물관 소장 중국도자)》, 首爾: 國立中央博物館, 2007, 頁125, 圖47。

虧破，曾以金銀飾邊，今當宴時，脫其飾而用之乎，因而用之乎」，講的是世宗曾將明國宣宗皇帝所賜陶瓷鑲上金銀釦邊，這一來可以保護陶瓷在使用時不輕易受損，也可借由金屬釦邊遮掩以往使用時造成的舊傷缺，但恐怕因此予人奢靡印象，所以世宗略顯猶豫地與臣僚商議，當宴請明國來訪使臣時，到底是要如實地展現金銀釦瓷？還是先卸除陶瓷口沿上的金銀釦比較合宜？結果參贊吳陞等人都建議「磁器則仍舊用之」。以上世宗的記事提示了幾個和本文有關的信息，即：世宗實時仍有陶瓷鑲釦之風，朝鮮王朝的匠人也具備鑲釦的技藝，更值得注意的是裝鑲在陶瓷口沿的金銀釦邊，似乎是可以自由的取下，而這就意謂著朝鮮王朝十五世紀的陶瓷金屬釦邊，已非高麗王朝所見難以輕易取下的薄胎寬幅類型(同圖14~17)，而應該是如故宮碗或本間碗般的厚胎窄幅的金屬釦邊。(同圖1、9)雖然如此，故宮碗和本間碗金屬邊飾的確實加工年代和地點依舊不明。唯可一提的是，由於本間碗金屬釦邊的作工和故宮碗頗為接近，也就是

說，看不出其和清宮傳世諸多陶瓷釦器作工有何不同之處(同圖12)，因此本間碗會不會竟是在朝鮮半島出窯之後，一度被攜到中國並裝鑲了金屬釦邊，而後再傳入日本？實在耐人尋味，其入傳日本的管道和性質不明，但可確認不晚於十八世紀。

除了從中國明州(寧波)解纜出航卻不幸罹難的新安船舶載有〈青瓷象嵌雲鶴紋碗〉(同圖5)，江蘇省揚州也曾出土飾雲鶴紋的高麗青瓷碗，²⁰然而同樣應該留意的是，《高麗史》載高麗忠烈王時代大臣曾獻畫金瓷器給元世祖忽必烈(卷一百五·列傳卷第十八·趙仁規)，忠烈王二十三年(1297)也遣使向元朝進獻「金畫甕器」(《高麗史》卷三十一·世家卷三十一)。上引考古出土和年代晚到十三世紀末的文獻記載，表明中國區域獲得高麗青瓷的管道既可由民間貿易，也包括外交使節的饋禮。前已提及，故宮碗在入藏清宮之前的流傳經緯不明，而本間碗在加賀五代藩主之前的收藏情況也不得而知，如果說本間碗有可能是從中國輾轉傳入日本，則其在中國期間會不會如同故宮碗般亦屬宮廷度藏

文物？這當然只是筆者一廂情願的狂想，但衷心期待在不久的將來有幸得見更多相關陶瓷金屬釦的科學化驗分析，或具有金工史背景的學者能以東亞鑲釦的視野進行工法的觀察比較，以便釐清本間碗在入藏加賀藩主之前是否可能一度到過中國。

（附記）本文圖9所掲載日本本間美術館藏「高麗青磁象嵌平茶碗」（山形縣指定文化財）彩圖，是承蒙該館田中章夫館長的協助，由山口博之先生所攝影賜下，謹在此對本間美術館及田中、山口兩位先生致上謝意。同意刊登的「画像許可書」為本美第29號（令和4年9月4日）。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講座教授

註釋：

- 除了故宮藏〈高麗青瓷象嵌雲鶴紋碗〉之外，西藏博物館亦見拉薩羅布林卡傳世的一件高麗青瓷金彩象嵌菊花紋渣斗，此參見：小林仁，〈中国出土の高麗青磁—新安沉船発見の高麗青磁の位置づけ〉，《美術資料》，90號（2016.12），頁57。
- 鄭良謨，〈象嵌青磁について〉，《東洋陶磁学会会報》，19號（1993），頁2；崔健，〈高麗陶磁の性格と展開〉，收入《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10・高句麗・百濟・新羅・高麗》（東京：小學館，1998），頁340。
- 中尾萬三，〈朝鮮高麗陶磁考〉（東京：學藝書店，1935），此轉引自：野守健，〈高麗陶磁の研究〉（京都：清閑社，1944），頁26。
- 野守健，前引〈高麗陶磁の研究〉，頁29-30。應該說明的是，長陵曾遭盜掘，今日所見標本均是劫後遺留。
- 不同定年的例子極多，無法一一列舉，擇例如下：1197年說見：長谷部樂爾，〈高麗の青磁〉（東京：平凡社，1977），頁111；1198年說見：崔淳雨，〈高麗陶磁の編年〉，收入《世界陶磁全集・18・高麗》（東京：小學館，1978），頁152；1202年說見：鄭良謨（金英美譯），〈高麗青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頁34；1255年說見：韓盛旭，〈高麗後期青瓷의 器形變遷〉，《美術史學研究》，232號（2001.12），頁80。
- 提示智陵因蒙軍入侵而再次修繕一事，曾見於1991年刊海剛陶磁美術館圖錄中所附年表（〈高麗時代後期 干支銘象嵌青磁〉，頁104），但詳情不明。
- 張成旭，〈新安船の高麗青磁〉，收入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新発見の高麗青磁—韓国水中考古学成果展〉（大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2015），頁30。
- 弗利爾美術館藏資料承蒙大阪市立陶磁美術館鄭銀珍女士的教示，謹致謝意！
- 本間美術館 <https://search.homma-museum.or.jp/search/d-000142-1965/#&gid=null&pid=1>（檢索日期：2022年8月1日）。
- 謝明良，〈金銀釦陶器及其有關問題〉，收入《陶器手記》（臺北：石頭股份有限公司，2008），頁163。
- 佐藤豐三，〈天目と茶〉，收入德川美術館編，〈天目〉（名古屋：德川美術館等，1979），表一頁235-238。
- 此參見：奧田直榮，〈天目〉，收入前引《天目》，頁201。
- 小林仁，〈重要文化財「木葉天目」に関する新発見〉，《陶説》，745號（2015.4），頁17-18。
- 川見典久，〈螢光X線分析による覆輪等の素材調査〉，收入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黃金時代の茶道具—17世紀の唐物〉圖錄（大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2015），頁105-107。
- 小林仁，〈天目の覆輪について〉，收入前引《黃金時代の茶道具—17世紀の唐物》，頁94-99。
- 國立中央博物館編，〈신안해저선(新安海底船)에서 찾아낸 것들〉（首爾：國立中央博物館，2016），頁315-317。윤도영氏等的韓文報告，是承蒙學棣張琨林的教示以及陳卉秀女士潤飾谷歌韓譯中文稿，謹誌謝意。
- 野守健，前引《高麗陶磁の研究》，頁15-16及頁25。
- 國立中央博物館編，前引《신안해저선(新安海底船)에서 찾아낸 것들》，頁315。
- 朝鮮半島出土金屬釦的綜合討論，請參見：윤도영，〈10-13세기 중국 및 고려의 금釦瓷器 제작과 전개 양상〉，《美術史學研究》，296號（2017.12），頁33-64。另外，承蒙高麗大學金允貞教授和德成女子大學金恩慶教授惠賜相關作品的高清圖檔，謹誌謝意。
- 馮先銘，〈中國出土朝鮮、伊朗古代陶瓷〉，收入《中國古陶瓷論文集》（香港：紫禁城出版社+兩木出版社，1987），頁330。另外，關於高麗青瓷雲鶴紋與宋代織品、繪畫等所見同類母題的比較，可參見：片山まび，〈高麗青瓷雲鶴紋考—從東亞比較美術史的觀點談起〉，收入余佩瑾等編，〈尚青：高麗青瓷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5），頁352-362。